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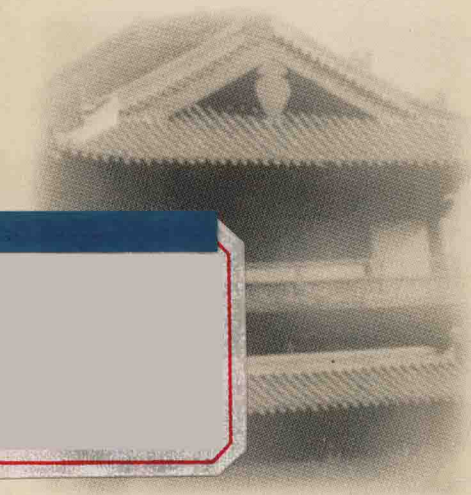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

总主编/李玉明

大同善化寺史话

赵一德 著

大同善化寺，是一处我国辽金寺院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宏伟的古刹。其佛教内涵、建筑结构、历史文化，皆有特殊的价值，也是大同市一大旅游资源。



目 录

引子	(1)
一、莫道不是开元寺	(2)
二、有座楼阁有唐风	(8)
三、辽金两朝重修建	(11)
四、北魏八角奠基深	(20)
五、朱弁留碑大手笔	(25)
六、王勃遗文一乘情	(32)
七、明清皈依善化寺	(36)
八、圆满功德惠后人	(40)
后 语	(46)

引 子

大同善化寺,是大同市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,坐落在今大同市旧城南门里西侧,是一处保存完整、规模宏伟的古刹。其佛教内涵、建筑结构、历史文化,皆有特殊的价值,也是大同市一大旅游资源。

探讨一下善化寺的来龙去脉很有必要。

善化寺不同于华严寺,它完全是汉文化风格的佛寺建筑,坐北朝南,三重大殿,左右配阁,方方正正,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,俨然一派王者之气。根据寺内现存碑记说,此寺始建于唐朝,唐开元年间称开元寺,辽金时代称大普恩寺,明朝称善化寺,俗称南寺。从现存寺庙规制及普贤阁的建筑风格看,隐约有唐代遗风;而其他主体建筑则是辽金建筑;另外三圣殿、天王殿内的塑像又是明清遗物。于是说该寺始建于唐、重建于辽金、明清再修(存碑皆作如是记载),多年来已成为定论,无争议。然而近年来,在善化寺周围(特别在南城门墙基内)出土了许多“和尚灵塔”及“经幢”,有一些文字尚能辨识,还有一些《颂赞文》比较完整。经过研读,偶然悟出:善化寺是大同唯一有瘞地(和尚坟)的寺院。从和尚坟这条线索,引起了对善化寺历史的进一步思考,考虑到在开元寺以前该寺应该还有前身。因为北魏平城时代,就有过一座有和尚坟的寺院——八角寺,那么唐建的开元寺是不是继承八角寺而来?

本文就是要沿着这条线索和思路,对善化寺来个刨根

问底,自然有些地方超越了过去的见解。这或许还有点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“两重求证”的味道。

一、莫道不是开元寺

猪修圜圖,糖修庙。(民谚)

老百姓不满意唐朝修庙和明朝筑城之风,说出这句“猪(朱)修圜圖,糖(唐)修庙”,是很有讽刺味道的。

明朝筑的城,距今较近,遗迹颇丰,人皆可见,不必细说。

唐朝建的庙,事隔千年,遗迹零落,当年盛况,令人难觅。

说到唐朝大兴建庙之风,由来已久。到了玄宗李隆基时代正当鼎盛时期,一切都趋向奢靡,佛教寺庙更不例外。开元二十六年(738),李隆基心血来潮,颁下诏书,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,统一按其年号命名为“开元寺”。当年各地奉诏建寺,自然风起云涌,并力求堂皇精美。有实力的州郡更是扩大规模竞相豪奢。那时候真不知中国建成多少个可观的“开元寺”。可惜好景不长,很快毁的毁,亡的亡,到明清之际,少数幸存者也大部分改头换面变了模样。完整的唐庙能传至今日者,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了。

不妨先让我们浏览一下今天国内幸存下来的“开元寺”。

今天只有福建泉州和广东潮州遗存着两个开元寺,那

也是面目全非、名存实亡的改建寺，还很难代表唐朝的开元寺。要说名实相符的开元寺，还只有大同的善化寺够格。

可是有何凭证说大同善化寺就是唐代开元年间的开元寺？

今天看来，只有它的整体布局尚可以说是一座唐代“开元寺”的格局。尽管现存的殿堂、塑像是辽金的后作，但整体布局未变，你完全可以在这里领略到唐代开元寺的气势。这正是大同的善化寺的精华所在，也是善化寺唯一能表现开元寺特征的地方。

不过非常遗憾的是：这个唐制的开元寺格局，却受到了“(朱)修圆图”的冲击，那就是“猪圆图”挤占了“糖庙”的山门。今天许多人把天王殿叫做山门，实在有些勉强，但也是出于无奈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据《大同府志》记，“洪武五年(1372)，大将军徐达，因旧土城南之半”，把原来周围二十里的北魏平城，缩为周围十三里的明大同城。徐达是出于军事目的，在北魏经隋唐辽金元沿袭相传的城址上“增筑”城墙，他利用了东西北三面旧土墙基址加高城墙，而把南城墙建在旧平城的南纬线上，从旧城址缩回来南面的一半。这一缩不要紧，南城墙就压在人家“开元古寺”的山门上了。于是“(朱)修圆图”在大同演了一出侵犯“(唐)修庙”的悲剧，结果唐庙的“主权领土”不完整了，不仅山门被毁，连山门至天王殿的好大块土地也被民间占用，一大截中轴线被切断。幸好今天“天王殿”至南城墙间的一段辟为广场，你还可以想像当年开元寺的气派。

善化寺的开元建寺之说，是碑文与文献记载下来的。

南宋大学者朱弁，在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碑中记：“按寺（即指善化寺）建于唐明皇时，道观皆赐开元之号。”这是首例提出这个善化寺（当时称大普恩寺）就是唐代的开元寺者。朱弁以南宋“通问副使”的身份使金时，在大同被羁留在大普恩寺十四年，对该寺了解最深，碑文所言是可靠的。（该碑现存善化寺）。

明代儒学训导张时中，在万历十一年《重修善化寺记》碑中记：“善化寺居城之南坊，地址宏阔，规制整肃。其始建于唐玄宗开元间，匾为开元寺。”说法可能是因袭朱弁的，但提出曾有过“开元寺”匾，则更为具体而明确。（该碑现存善化寺）

明代进士、奉政大夫张尔基在万历四十四年《重修善化寺碑记》中记：“吾云中有善化寺，创自唐之开元间。规制雄伟，为大拓（招）提。”他指明当年这里是一个“大招提”（据《翻译名义集》“后魏太武始光二年造伽蓝，创立招提之名”。此后遂将原梵语“招提”的“四方僧坊”之义，扩展为寺院的异名。碑字为“拓提”），乃是一个大寺院了。（该碑现存善化寺）

清代云郡庠生田士元，在乾隆五年《重修善化寺碑记》中记：“云中有善化寺。居城之西南隅。地址规制，宏阔端严。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名之曰开元寺。”所说虽无新意，但对开元始建说是一个总结。（该碑现存善化寺）

另：《山西通志》（光绪本）卷五七，古迹考八，载：“大普恩寺，在大同县东南（西南），开元间建，赐名开元。石晋初，

易今名。”

《大同县志》卷五营建·附寺庙，载：“善化寺，在南红门西，唐开元间建，赐名开元。石晋初改名大普恩寺，岁久废。……俗名南寺。”

应该说，有这么多的碑文、文献的记载，肯定这里为唐代的开元寺该毋庸置疑了。可是并不那么简单，近代大建筑家梁思成先生就不认可这些说法，他提出：“通志、县志谓创于唐开元间，赐名开元寺，确否难知。”尽管梁先生对朱弁的碑文很欣赏，他夸赞说：“知朱氏所记，精窍异常，非如寻常碑记，徒鹜词藻之骋驶者。”（梁思成、刘敦桢《大同建筑调查报告》民国22年中国营造学社版77、78页）而对朱弁碑主张的“开元寺之说”，梁先生却并没有盲从。梁思成先生提出对开元建寺之说的怀疑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建筑学家注意的是建筑物，梁先生在这里看不到唐代的建筑物，自然就不信“开元说”了。那么到底谁是谁非？

让我们再仔细研读一下宋明清诸先贤的碑文，不难发现，果然他们谁也没说此寺内有唐代建筑，而着眼点是在寺院的“规制”上。看得出，前人认定这里是唐开元寺，是以那种端正、对称、煌煌然的气派，确有大唐风范之“规制”为依据的。而梁思成先生的着眼点则是放在建筑上，没有唐建，怎能说是“开元造”？难怪要发生分歧了。因为是各执一端，各有各的道理，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肯定哪个或否定哪个。得仔细分析，而且空间很大。

那么让我们先看一看“规制”。

如下图所示：它是在中轴线上排列出的三座殿堂和业

已消失的山门,依次为:大雄宝殿,罗汉洞(图标三圣殿),天王殿(图标山门),及照壁(不知有何根据)。大雄宝殿与罗汉洞之间东西侧又有三层楼阁式的文殊阁(已毁图未标)与普贤阁(西侧尚存者)。据测算今存总占地面积尚有 13926 平方米。仅凭此图说它“自古号为大兰若”就不是虚语。

就从现在存在中轴线上的三大建筑的布局来看,请你和今天故宫的“三大殿”比照一下:你看,故宫的三大殿,还不是把这里后面的大雄宝殿移到前边而为“太和殿”;把前面的天王殿作为中间的“中和殿”;把中间的三圣殿作为后面的“宝和殿”吗?只是颠倒了一下位置而已。真还没准明永乐皇帝修建皇宫三大殿时,就是从这里受到启发,而作为蓝图底样,略加修改而成呢。这么说来,如此气度不凡的大布局,也只有盛唐的开元时代才能创建出来。当年云中城的开元寺真还不同凡响呢。

另外,唐朝的开元寺范围,绝对不是今天的善化寺的这点范围,在中轴线两侧与前后必然还有许多附属建筑,就连辽金两朝大普恩寺的范围也要比现在大得多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寺院还有“瘞地”(和尚坟)、“籍田”、“菜圃”等附属领地,那范围就更大了。

据近年出土的不少和尚灵塔、幢塔、舍利塔的位置,可以判断和尚坟墓就在善化寺的南面,很有可能该寺的“瘞地”,就在该寺山门隔街的某个“坊”内(亦即平城南纬线之南一个或几个里坊)。对照《宋史·朱弁传》所记,朱弁在绝望中召集同被囚禁在西京的同僚时说出的那番诀别语:“吾已得近郊某寺地,一旦毕命报国,诸公幸瘞我其处,题其上

曰‘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’于我幸矣。”看来这个“近郊某寺地”实指善化寺对面的瘞地。大约辽金时期平城南纬线以南地区就已经荒凉了，所以朱弁说它是“近郊”。善化寺有这么一块寺院瘞地，是研究善化寺历史的重要线索，后面我们将沿着这条线索追述善化寺更早的历史。

这里先检索一下出土的“和尚灵塔”：

1980年拆除南城门城基时，在城墙夯土中发现：(1)（金大定二年，1162年）“观音院故敬公塔记”；(2)（金大定十七年，1177年）“普恩寺高僧院英师幢铭”；(3)（元天历二年，1329年）“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舍利塔”；(4)2002年6月，大修天王殿时，在其西侧围墙地基掘出（金大定七年，1167年）“善护大师灵塔”等。时间跨度（1162—1329）达160余年，展示着这里自金至元埋葬僧众的宏阔场景。这里既然有这么大的瘞地，那么相应的籍田、菜圃之属估计也不会小，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遗迹，姑且不论。仅从上述遗物，已可以证明这片瘞地的规模是相当可观了。应当说只有盛唐时才有这个气度，也只有开元年间才能扩展这么大的领地。这一点也可以算是唐建开元寺的一项佐证。可惜这个佐证被破坏了，今天看不到了。这个瘞地的破坏，明显是被朱明王朝修筑“圆圃（城）”时侵占了。

梁思成先生若能见到这些出土遗物，也许就不会怀疑开元建寺的说法了。更何况善化寺的某个建筑还留有一些唐风！

二、有座楼阁有唐风

“历史”一旦板起面孔来，可有点近似“无情”。唐代精心修筑的寺庙，今天已如“辰星之寥落”。莫非真是“糖”捏的？

的确，一度繁花似锦的“唐庙”，经过“安史之乱”、“残唐五代”的战火洗劫，剩下的本已为数不多，再加上宋辽金元明清的岁月磨砺，今天能有几许残留？难怪建筑学家对唐建之庙，既眷恋，而又不敢轻易认可某个建筑确实是“唐”的。事实上，今存的“唐庙”太稀少了，要说找一座完整的寺院，或一组唐代的建筑群，那简直是大海捞针。今天能比较踏实点说的“唐建”，不过是一殿、一塔、一像、一经幢……而已。这里说“庙”，大概能数得上的还得说山西五台山的“南禅寺大殿”和“佛光寺东大殿”两处。而五台山的两个殿充其量不过是“单殿”之遗迹而已。当然这也已经很了不起了。（至于扬州大明寺内的鉴真纪念堂，虽说有些唐建式样，可那还是从日本“反馈”回来的复制品。）

而大同善化寺，不仅保存了唐建的寺院规制，还保留了一个唐建遗风的普贤阁。

普贤阁，位于大雄宝殿与三圣殿之间的西侧，现在完好地屹立着。（原在东侧还有过相对称的文殊阁）这是一个平面方形的两层楼阁，三间见方，重檐九脊顶，面东，下有阶基，中设栏版，上层开窗，庄重古朴，唐风宛然。辽金时有重

修的痕迹。但未变式样。留下唐建遗韵亦为难得。

但是梁思成先生判断它是辽代建筑,他说:

阁之建造,未见于寺内碑碣,但就结构方式考之,其斗拱之分配各层只用补间铺作一朵;又下层用替木,上层用六十度角华拱;及方整之阑额头;与屋顶坡度等,皆足证明其与大雄宝殿属同时代(按大雄宝殿为辽建)要亦辽末幸免兵燹之遗构也。

建筑大师之说自然有其权威性,所以人们只好绝口不谈是唐建了。但是上世纪 50 年代落架大修时,却在普贤阁的梁头上发现有“贞元二年一行造”的题记。一下子让人们联想到唐德宗李适的那个使用了二十一年的贞元年号(785—805)。而且一行和尚还是唐朝著名的科学家。凭这个题记完全可以确定普贤阁是唐建了。但是维护梁思成权威的同仁们又提出:金海陵王完颜亮也有贞元年号(1153~1156),唐朝的那个著名的一行和尚早在开元十年(727)就已经圆寂了。所以这个题记更应该是证明为金建者。这么一来问题反而复杂了,二者相差 368 年,到底该依哪个?真还值得认真分析一下:

让我们先从“金贞元二年”作个分析。金贞元二年(1154)距离圆满和尚重修普贤阁的“皇统之癸亥”(1143),相差仅仅十一年,据《朱弁碑》所云:“经始于天会之戊申,落成于皇统之癸亥。凡为大殿,暨东西朵殿,罗汉洞,文殊、普贤阁,及前殿,大门,左右斜廊,合八十余楹。”至今这些建筑

除文殊阁、大门、左右斜廊已毁外,其余都完整地保留了金代的原貌。这一段时间至今经历了八百六十余年(1143—2004),怎么能出现才十一年就再建普贤阁的情况呢?所以这个“贞元”年号不是金海陵王的。那么如果用唐德宗的“贞元二年”,首先就得弄清这个一行和尚。其实也很简单,这个一行和尚,不是开元年间的那个通晓天文的一行和尚,是两个人。然后理顺唐贞元年间修建普贤阁,与开元年间的建开元寺的工程关系,原来开元二十六年改建开元寺,先只是建成了中轴线上的三重大殿和山门,只能算是第一期工程。又过了四十八年(738~786),来了个游方僧就是一行和尚,他积攒了点财富,发起愿心,就在大雄宝殿前面的两侧,建起了东面的文殊阁(已毁)和西面的普贤阁(现存),为开元寺作了锦上添花的功德。使得唐代的开元寺更加壮观(当然这两个阁的建筑式样是唐朝的了)。大约金代圆满和尚修复该寺时,这两个阁还保存完好,所以圆满对此两阁重修时,没做大的变动,而且连材料也大半用得是原来的,于是梁上的题记也就保留下来了。正因为如此,才使我们在今天善化寺的辽金建筑群中,总觉得普贤阁与众不同,独有唐风。

看来说普贤阁是唐建,不仅仅是单纯的风格印象,而且还有题记、姓名为证。金代圆满修复时,不忍湮灭一行和尚的功绩,把题记以至原来的栋梁材全部保留下来,可以说既是高僧的德行,也是有识之举。这样就给我们留下这一唐韵悠悠的普贤阁。

对面的文殊阁,是在民国初年因邻居失火被烧掉的,梁

思成先生来时已毁了,也没能看到。据老一辈亲见者口述,文殊阁与普贤阁是一对双阁,式样基本一样,但看起来文殊阁比普贤阁更为壮观些,盖因文殊菩萨毕竟是上首菩萨。设若该阁尚存,不仅善化寺又增一景,而且对考证唐庙又可能多一个实物证据。

假若当年梁思成先生见到这个题记,他将是如何判断?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梁先生的这种不拘泥于文献和成见的研究精神,给予后人探索的鼓励,也启发人们应当更进一步去追寻这个寺的源头和开元寺以前的历史。

三、辽金两朝重修建

煌煌大唐的开元盛世,随着安史之乱走向下坡路;黄巢造反,弄得“秋风肃杀满长安”,繁华都城竟成了“可怜焦土”。那些在全国精工修筑的无数开元寺,自然也就随之而化为阵阵烟云了。而大同的开元寺却不知怎地有幸保留下来,而且几乎是完整地保留下来,还在战乱中添了一口大铜钟。

残唐五代时,中原逐鹿,黄河两岸,藩镇势力此起彼伏,一代又一代。突厥人的一支又兴起一个沙陀族。他们粉墨登场了。第一个就是后唐李克用。他的父亲李国昌,发迹于大同,得了个皇家赐姓的李,竟起兵云中,占据晋阳,俨然以皇家的宗族自居,以灭掉后梁朱温的成就,赫然打出了

“后唐”的旗号而称王了。其实他们没干一点有利于李唐王朝的事情。传到第三代,兄弟两个拼杀了一番,干儿子李从珂夺了真儿子李从厚的王位,年号清泰,当上了后唐的末代皇帝,坐了三年江山。就在清泰三年(936)大约预感大祸临头,才想起应该为李唐作点功德了,功德就作在他统辖区内的云州(大同)开元寺。他给开元寺铸了一口铜钟,还在钟上留下文字云:“清泰三年岁在丙申铸。”

这口铜钟虽然没能挽救后唐的灭亡,但却给云州开元寺壮了声威。不仅开元寺显赫了,连云州的地位也引人注目了。契丹人的目光在铜钟上转来转去,看出了云州这个城市的军事、政治、文化价值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暗自盘算着……

后唐的女婿石敬瑭,也是个沙陀种,说不清什么时候改姓了石。他和那个干儿子李从珂还是大舅子或小舅子的关系。他凭着驸马的身份和一点战功,当上了河东节度使,坐镇太原。任务是抵御契丹。谁想到就在开元寺的铜钟刚刚敲响时,他却和契丹人勾结上了。他在耶律德光的军事支持下,推翻了大舅子的后唐王朝。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“大晋皇帝”。石敬瑭感恩不尽,以四十五岁的“齿口”,拜三十四岁的青年耶律德光为父皇,自称儿皇帝,就凭这份齷齪也“名扬千古”。然后就割让“燕云十六州”给他的干爸爸。

从史称的“燕云十六州”来看,燕、云二州,是十六州中的重要城市,“云”即今大同。果然契丹人很快就把燕州立为其南京,以后又把云州立为其西京。他们在西京最大的收获就是许多佛寺落入他们之手;在开元寺,则是大铜钟震

撼了契丹人的心。

契丹人信佛。开国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，早在天复二年(902)就在他的故土龙化州建造了开教寺；十年后(912)又在上京(辽阳)建立了天雄寺；天赞四年(925)他行幸安国寺，大肆供养僧众，如此这般，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。他的儿子太宗耶律德光也信佛，当他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云州，城里有那么多的堂皇巨刹落入怀抱，尤其开元寺的钟声是那么悦耳悠扬，耶律德光怎能不欢喜，契丹人怎能不动心呢！

契丹人在唐朝的开元寺内流连忘返了，他们抚摸着铜钟，凝视着大雄宝殿，顾盼着文殊阁、普贤阁，比照着他们的开教寺、天雄寺，心潮起伏，确实不可同日而语。他们必须据为己有。自然，首要的就是改变寺名，开元寺是李唐王朝的，太刺激，于是一改而为：大普恩寺。至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，可能与那个清泰铜钟有点关系。

那时铜钟铸成不久，不仅声音洪亮、悦耳，而且金光闪耀，熠熠生辉，特别当阳光照射的那一刹那，反照中会幻显出无尽的佛光普照。契丹人可能还没见过。突然钟声敲响，梵音遍布大地，如雷音振聩，如佛韵悠扬，一时间开元寺内芬花遍地，呈现一派净土景象，契丹人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，摩呵“大普恩”……开元寺的钟声，深深印入契丹人的心灵深处，那是拂之不去的。

这种说法，当然是“望钟生义”，是不是那么简单，后面再分析，这里且放下。

后来云州成了契丹人的西京，而且还为他们的祖宗建

立宗庙而修建了大华严寺。当然对开元寺也得有所保护，特别是那里的钟声还经常与大华严的钟声相呼应，皇帝们的灵魂常常被这后唐的钟声所鼓舞。所以契丹人肯定保留了它。

金代圆满和尚重修大普恩寺时，这口铜钟还赫然悬在钟楼上。朱弁也亲眼看到了，还写在碑文里。可见女真人也没动它。

以后明代的碑文中就再也没人提这口钟了，大概它已不见了。

是在哪一年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什么人把铜钟给毁了？还是被搬走？没人知道，也没人追问了。这里如此念叨这口铜钟，因为它是该寺的喉舌，会说话。

可近年有一则信息：河北正定县城内保留有“开元寺钟楼”和“大铜钟”。据该县县志及寺内碑文云：“寺为东魏兴和二年(540)始建，唐乾宁五年(898)重修，历代均有修葺。现寺内仅存钟楼一座，内悬唐代大铜钟。另存唐砖塔一座。”这个铜钟是不是清泰三年铸的那个？有嫌疑，你若有兴趣不妨访一访。

现在让我们撇开铜钟，再把注意点聚焦到这个开元寺——大普恩寺上：

好端端的、响当当的“开元寺”名号，为什么要改成个“大普恩寺”？

宋儒朱弁对此更名是大惑不解。他在碑文中大声疾呼，请求解答，他说：

寺建于唐明皇时，道观皆赐开元之号，而寺独易名，不见其所自。……其易今名，当在石晋之初，或唐亡以后。第未究其所易之因。而后之作者，[若]见其阙文，倘得其本末，为我著之。乃予之志也。非特予志，亦寺众之所欲闻也。

这个问题朱弁是在金皇统三年(1143)提出的，到今天已经过去 860 多年，始终没人回答。是因为问题难呢？还是人们不屑去解答呢？若属后者，那就太辜负朱弁与众僧的一片热切企盼之情了。

今天研究这个寺，还非得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不可，但这又谈何容易，就凭那点“钟声”的推想，就能说得明白？那未免太简单了。朱弁问题的核心是：不知道它改名的原因（“第未究其所易之因”）。要求找出其改名的“本末”。八百多年前的古人都找不到文献依据，你今天就想弄明白，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？不是，今天还真有点朱弁没有见到的文献。那就是 1974 年应县木塔出土的“辽代秘藏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山西应县木塔（释迦佛塔）出土“辽代秘藏”。可以说是动乱年代中考古界的一个偶然成果，是一次重大的“考古”发现。它解决了契丹辽在佛教事业上的若干疑难问题，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回答朱弁所问的改名为大普恩寺的原因。

大唐天子命名的开元寺，在汉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、御封的，何况云州的开元寺又如此气派，汉人是不会轻易改变它的名称的。就连后唐的沙陀人李家父子，已沾皇姓，也不